

10/13

昆山文史

第六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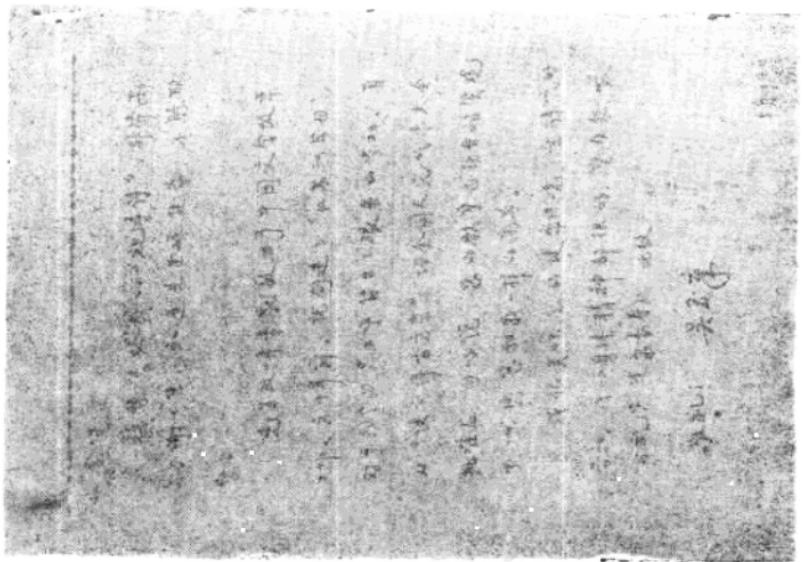




右图：修葺一新的「王安旧居」客堂

上图：王安博士在观看王氏家谱和六世祖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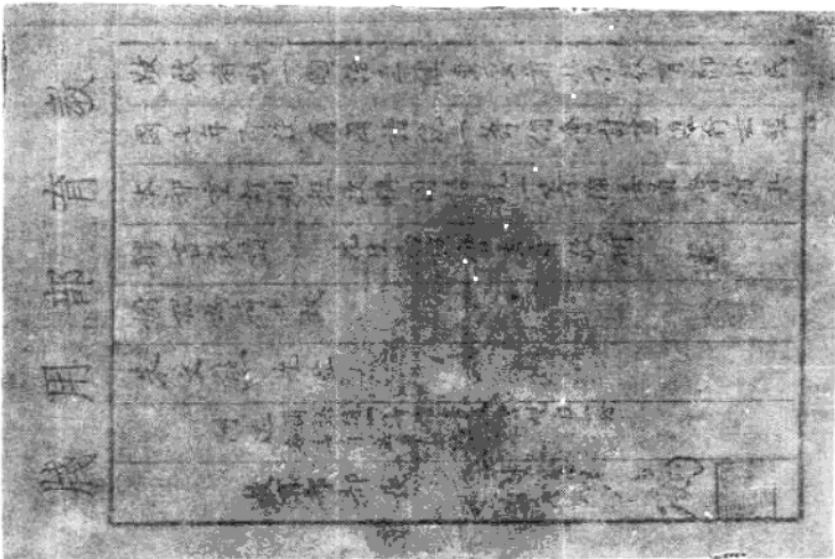




59年5月文字改革委员会

主任吴玉章给朱文彬的复信

(朱章乐供稿)



转书——国民政府教育部长薛梦麟聘朱文彬任“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委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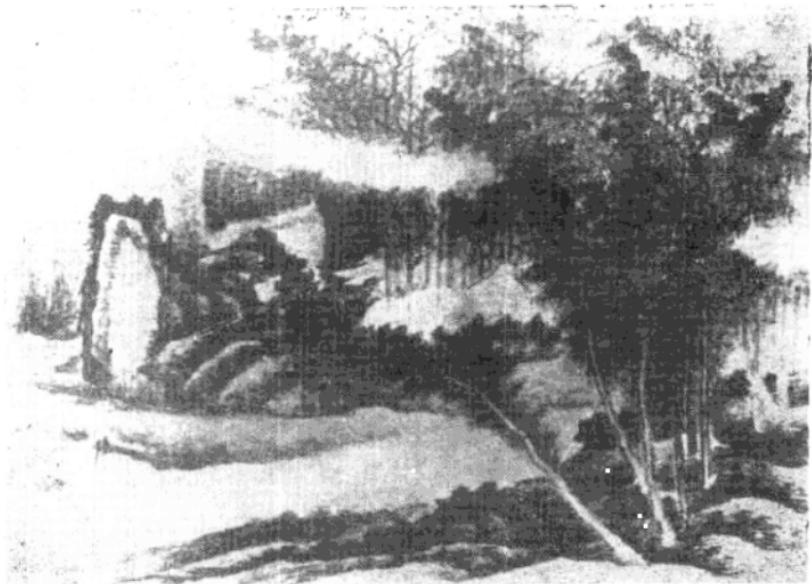
教育部用字部

敬啟者此一函為申請准許之件
民國七年二月八日請准許此函為申請准許之件
本部宣訂列祖故典之文書一文傳達各部司局
附文稿請准許此函為申請准許之件
此函為申請准許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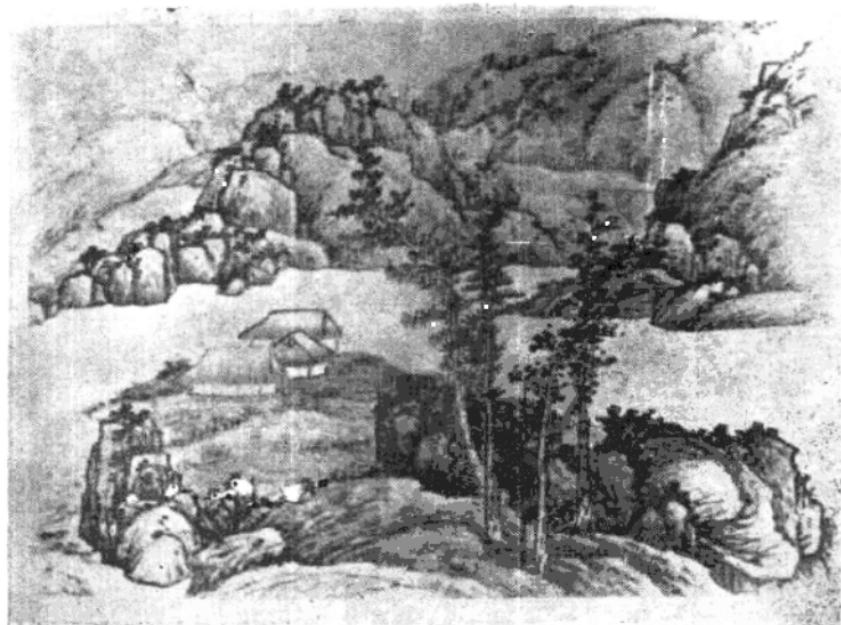
(王振鵠供稿)

〔清〕葉 賢
《溪山无尽图卷》局部之二





龔 賢《山水冊》之一



龔 賢《山水冊》之三

(王振德供稿)

目 录

| | | |
|-----------------------|-------------|--------|
| 国民党抗日将领徐祖贻三事 | 席 纳 | (1) |
| “宋氏家族”第一人 | | |
| ——宋耀如在昆传教记 | 戴 祥整理 | (10) |
| “汉语拼音”先驱朱文熊 | 朱章乐 | (18) |
| 服务于社会 | | |
| ——邵汝干先生自传(下) | 邵汝干遗稿 | (23) |
| · 资料 · 有关昆山小学罢课新闻报道二则 | | (41) |
| · 毕生从事文化教育的朱爗新先生 | 朱肖鼎 | (42) |
| 科学家企业家王安博士 | 本 刊整理 | (47) |
| 徐公桥乡村改进区追述 | | |
| ——黄炎培手创的第一块实验园地 | | |
| ····· | 阮南田 | (60) |
| 徐公桥乡村改进区琐记 | | |
| ····· | 朱耕源 张 果 石鼎和 | (77) |
| 记中央大学昆山稻作试验场 | 李文宽 何兆熊 | (85) |
| “起愤”学堂 愤而不起 | 顾庆中 | (95) |
| 昆山县城根营地及城垣砖石 | | |
| 扩充教育经费史实 | 顾庆中整理 | (97) |

“晓庄”精神在蓝塘

——回忆昆嘉青三县联立乡村师范

.....周力民(101)

弹词名家严雪亭.....刘宗英(109)

二胡圣手陆修棠.....朱为绳(118)

昆山腔与昆山传人.....王业(126)

昆剧故地“堂名”活动续谈.....黄国杰(135)

解放前昆山轮船业.....潘兰言(146)

旧社会的石浦航船业.....石浦乡乡志编修组供稿
本刊整理(153)

光复前后的昆山民团.....王鼎遗稿(157)

穿街过巷话沧桑.....杨馥清(161)

“金陵八家”之首——龚贤及其艺术成就

.....王振德(177)

《昆山文史》第1—6辑总目.....(186)

·封二· 封面图幅说明

·封三· 龚贤《溪山无尽图卷》局部之一

·插页· 图版七幅

国民党抗日将领徐祖贻二三事

序 纳

在雄壮的乐曲声中，银幕上推出“血战台儿庄”五个粗红大字，随着在硝烟弥漫的徐州原野上，李宗仁、徐祖贻、孙连仲、张自忠等国民党高级指挥官的形象，一个个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影片中出现的昆山人徐祖贻，是国民党部队中颇负盛名的军事战略家，在徐州大会战中，他担任了五战区参谋长之职。

手头资料有限，姑以李宗仁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中的介绍以明：

“徐君为江苏昆山人（编按：原文误为无锡人）。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日本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为人十分干练，军事学识也极丰富。北伐前在奉军^①服务，十七年曾任张学良代表，来北平和我方接洽东北易帜事，但是那时因徐君先期离平，我们未能晤面。‘九·一八’以后，徐君奉调至中央，出任军令部第一厅厅长（编按：军令部成立于1938年2月，掌关于国防作战事项），筹划作战事宜，颇有能名。我受任五战区司令长官时，想由军委会中选一干员为参谋长，以便和中央联络，因而想到徐君，我们虽未尝谋面，然一经把晤，即一见如故。”这一小节，作者忆述了他和徐祖贻初次交往经过，并对徐的主要经历和军事才能作了粗略的介绍。

徐祖贻（号燕谋）是昆山教育界前辈徐冀扬先生的长子，幼年随父在金家庄蒙养公学读书，时国事日非，仁人志士怀着一股热血，纷纷投笔从戎，徐在时代潮流推动下，考入了保定军官学校。从这时起，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活——但他始终没有统率过一兵一卒，一直以高级幕僚身份参谋其事。

奉张学良命，洽谈“东北易帜”

从保定到日本士官，这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很多军人是走这条捷径的，蒋介石等人就是靠这一台阶直上的。至于从士官升上陆大的，旧军人中似不多见。徐自陆军大学成归国后，通过他父亲在吉林司法界工作过的关系，进入了奉军。据他的亲属回忆：他初去奉军时，只是坐坐办公厅的一个长官，不受重用。一次奉军司令张作霖去司令部要他的副手杨宇霆办一速件，杨适不在，其它要员也都提前下班，张就把这件事交徐去速办，就在这件事上，徐有幸受到了这个大帅的青睐，以后遇有棘手难办的事，往往交由徐去处理。

《回忆录》中所述“东北易帜”一事，就是明证：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攻下北京、天津以后，蒋介石以北伐大业告成，并向中山先生灵前祭告为由，亲赴北平。这是贪天下之功为己功的一种手法。时奉军统帅张作霖于六月四日在其专列回奉经过皇姑屯时被日本人炸毙，一时间，人心慌慌，谣诼四起。少帅张学良看到日本人对东北的野心，一面尽撤奉军出关，一面派以徐祖贻、邢士廉等代表到北平商议和平统一问题。而直鲁军军阀张宗昌（编按：原系奉军一支）等残部仍盘踞滦州，并声言要破坏张学良的易帜进程。

因此，蒋介石要白崇禧代行总司令职务，坐镇北平，肃清关内军阀残部。这一期间，徐祖贻穿梭于白崇禧和张学良之间，利用他与白在“保定”的同学关系，几经洽谈东北易帜问题。最后在白崇禧率领的东征军与奉军总攻包围之下，逼使张宗昌残部归顺改编，张宗昌也下野隐退。1928年12月29日，关内外奉军正式宣告“易帜”，即把原来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换上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并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领导。这就是民国史上重要的一页：“东北易帜”。

徐祖贻在这一件事上，初露头角，受到了各方的注视。

参加芦沟桥事件会报，决定“和”与“战”

“九·一八”以后，徐祖贻奉调至南京军事机关工作，一度曾在陆大担任校长，抗战前夕，调任为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掌关于对敌情报、对外宣传和外国武官接待等事宜。此时，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在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下，全国出现了新的抗日高潮。在芦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才被迫应战。就在事变发生后第四天，从七月十一日至八月十二日一个月中，国民党政府军事机关主要长官、幕僚及有关人员，逐日在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官邸举行会报，决定国民党政府“和”与“战”及其军事部署。

会报共举行了三十三次，会议时间多在晚上九时开始。参加会报的，除何应钦外，有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陈调元、军委秘书长张群、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军政部次长陈诚、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军委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

钱大钧、宪兵司令谷正伦、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等四十人左右，徐祖贻以参谋本部第二厅厅长的身份参与了会报。根据《民国档案》所辑资料的会议记录，他先后参加了二十三次会议。

从“档案”记录上反映，当事变初起时，敌我双方的态势是这样估计的：

我方存储弹药（包括各种炮弹）如以二十个师计算，可供作战三个月之用；粮秣以五十万人、马十万匹计，仅够一个月；使用于第一线之飞机约200架。至于军队之素质，诚如参谋本部程潜总长所讲的：“现最可顾虑者为我军之质量与训练尚不够现有武器之地位。”

敌人方面，时投入在平津兵力不过五、六万人，并据宋哲元报告，似是少数军人局部性行动。会上，也作了这样的部署：如果事态扩大后，除了调遣国民党各部队北上抗敌外，并于“必要时命令第三者（原编者注：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出绥东侵内蒙，以扰敌之侧背。”

徐祖贻在会报席上除了通报敌情并作出相应的判断外，也会报有关前线我军之战况，有些涉及到战时公法与对外宣传方面，也交由他提出处理意见供军方参考。因此，在“和”与“战”的问题上，他的意见是颇具影响的。

如第六次会报会商事项中，由行政院会议提出，对日作战是全部化，或局部化，及绝交或宣战之手续与步骤等问题，当即决定由徐负责与外交部会商，研究其得失。翌日，第七次会报时，徐即席作了以下的结论：

①正式冲突后，外交部即发表一正式宣言，叙明日本对我压迫，我不能不自卫之理由。（宣言稿已作准备）

②关于断绝国交，如绝交后，双方即具有交战国资格，

现日本海军绝对优势，日本即可以交战国地位通告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及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其范围甚广。现我国一切军用品，能否自给自足，大有问题。

又绝交后，日本居留民及日租界之日人，仍可迁入英、法租界居住，依然可以作造谣、扰乱、谍报等工作，英、法租界必加以保护，我无法驱逐及拘捕之。但我国在日本之侨民则无法保护，将被驱逐，甚至拘捕，而我亦无如许船只装载侨民归国。

故两相比较，绝交后日方可以行使交战国之权利，我方则不能享此交战国之权利，因之交战后，不宜绝交，仍以如“九·一八”时状况为宜。

徐在会上的结论，即为蒋介石所采纳。所以全面抗战一开始，双方是在“不宣而战”的情况下进行激烈的战斗，直到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我国才正式对日宣战，权其得失，这一策略对我这个“弱国”是有利的。

芦沟桥事变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就在八月十二日晚九时召开的第三十三次会报会上，也是芦沟桥事件会报最后一次会议，又传来了上海方面的紧急情况。事实上，早在前三天第三十次会报上，徐根据敌人的动向已作了这样的判断：“敌在沪陆战队仅三千人，由汉口来者千余人，连同在乡军人，亦不过六千人。在未增兵到沪以前，似不致发动事变。惟现在既已发生虹桥机场事故，则日方或借借口保侨，向上海增兵一、二师。”这一判断，现在已成了历史，但从当时日寇在沪发动战事的部署上，完全得到了证实。

身临前线，取得临沂大捷

随着战事的深入，我军逐步向大后方转移，平型关作战的大胜利，打破了敌人自恃不可战胜的迷梦，接着迎来的是徐州大会战。

徐州大会战的主要战场摆在台儿庄，而临沂一战又是取得台儿庄大捷②的决定性一役。直接指挥这一战事的是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为了便于指挥，挂上将衔。电影《台儿庄血战》映出的临沂一战，历史地反映了徐祖贻以李长官身份身临前线去督师的。

临沂，为鲁南军事上必争的重镇，得失关系全局。军团长庞炳勋手下只有五个步兵团，实力不及一个军，他是“杂牌军”，一直受到蒋介石的歧视，但出于民族大义，仍能维持于不坠。1938年二月下旬，临沂守军渐告不支，连电告急，李宗仁遂令五十九军张自忠部赶往增援。张与庞素有宿仇，张私下对徐祖贻说：“任何战场皆可拚一死，唯独不愿与庞炳勋在同一战场。”这一僵局，在李宗仁、徐祖贻劝说下解开了。最后由徐参谋长和庞、张协商确定“以攻代守”的作战计划，经过了五个日夜的苦战，取得了临沂大捷。

临沂一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矶谷、坂垣两师团拟定在台儿庄预定的会师计划，为下一步台儿庄战役歼灭矶谷师团创造了先决的、有利的条件。

有几件事，虽属传闻，但在当年徐的周围，却津津乐道。

在台儿庄会战前，日寇的主机场还在南京，及后干脆移至山东中部大汶口，这样近距离来去，半小时即可完成一次

飞行。为了确切侦知敌人主要机场所在，徐乃亲冒万死，伪装成一名大佐，带了两名机灵的尉官，深入前沿，适和敌人的骑兵相遇，因他是日本陆大出身，一口流利的日语以及对敌情大体上的了解，最后通过巧妙的周旋和对答，乃得确切侦知机场所在，从而采取了相应的防卫措施以减少损失。

坂垣是侵华日寇中的元凶，长期在中国东北做情报工作，他原是日本陆大教官，因是师生关系，所以徐早认识了。这个坂垣也是临沂城下一名败将，但他很懂得“攻心为上”战术。

一次在空袭中投下一封信给徐，大意是：“……支那兵不堪一击，韩复榘能接受劝告……半月后，我请李长官和你到东京玩玩。”“玩玩”，即是被俘活捉的隐语。好大的口气！

徐将这封信私下给李长官过目了一下，并请示要不要复信，李讲：不复。徐则另有所图，说这是个好机会，复。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人各为其主’。你为日本，我为中国。我们中国军队一时的失利，不等于就屈服求和。我们并不排除在你们华中、华北两面夹击下的失败可能。你请我们到东京，我们请你到汉口玩玩。”

那个狂妄的坂垣竟又来信：“我们大日本皇军对支那兵以一当十，何劳北支（华北）派遣军来助战……”。坂垣似乎忘乎所以了，他自己就是属于北支派遣军的第五师团长。

以幕僚终其身，病逝台北

日本投降后，徐随第三方面军去南京、上海接受日军投

降（沪宁地区的日军约三十三万）。徐的名义是“总参议”，这是一个挂着大衔头的闲职。这期间，他曾有几次来过昆山，除了在上海净土寺为其先父冀扬先生设奠追荐外，又去巴城乡下祭扫祖茔，又曾应地方故旧之请，担任了昆山第一信用合作社的董事长。

1948年4月，李宗仁当上了国民党副总统，但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把原任国防部长白崇禧调往汉口任华中“剿总”总司令。这是蒋介石自抗战以来对李、白两人一贯所采取的隔离政策。而徐祖贻因白的举荐当上了“剿总”参谋长这个不光彩的角色，仅及一年，不堪一击的华中“剿总”部队，在粤桂边境几乎全部被人民解放军南下大军歼灭，总部迁至海口（海南岛），“剿总”也改称为华中长官公署，只等出海逃命了。1949年12月中旬，蒋派专人去海口，邀白去台北组阁，白为了摸清蒋的意图，特派副长官李品仙偕参谋长徐祖贻去台探问究竟，白在部下的怂恿下，于年底飞台与蒋再一次“合作”了。而徐在台湾，由于他与桂系的关系，特别在李宗仁回归祖国、一年之后白崇禧病故台北后，其晚年的遭遇，自可想见。他一度继狄膺之后，担任了留台的昆山同乡会会长。这个曾经为抗日大业立过成功的老人，也渐被人们遗忘了。1972年，他默念着留在大陆上五个儿女，黯然地离开了人间。终年七十又八。

（本文有关传闻部份，多得自李忠霖、戴明玉两位同志提供的口碑材料，特此志谢）

编者注：

①奉军：北洋军阀张作霖所部。辛亥革命后，原奉天（今辽宁）清军统领张作霖迅速扩张势力。1916年春，张驱逐袁世凯北洋军部将领段祺瑞，为奉天督军，进一步扩编其军队，势力渐及于吉林、黑龙江两省。因称张作霖所部为奉军。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军曾一度占领江苏、安徽。1925年2月中旬以梯队司令方振武率领的奉军曾驻扎昆山，敲诈勒索，军纪败坏，害民不浅。

②台儿庄大捷：1938年初的徐州会战中，由李宗仁指挥一部份国民党军队歼灭日本侵略军一万余人于台儿庄，并俘敌五、六百人，击毁敌坦克、战车数十辆，飞机数架，缴获大炮七十余门，轻、重机枪百余挺及大量其他战利品。取得了八年抗战中国国民党军队的一次最大胜利。以上数字，摘引自最新所见的档案资料。

“宋氏家族”第一人

宋耀如在昆传教记

敢 祥 整理

宋耀如先生是已故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的父亲。他共有三个女儿，宋庆龄排行第二，后来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大女儿是宋霭龄，即孔祥熙的夫人。三女儿宋美龄是蒋介石的夫人。此外还有三个当大官、巨贾的儿子：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在外国人笔下，人们称它为“宋氏家族”。宋耀如膝下的这群儿女（包括三位女婿），在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舞台上都有不同的作为，历史功罪，各有千秋。

宋耀如是一个虔诚的宗教徒，但他也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理想主义者。在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时，他热情地为他宣传过美国式的民主思想；在中山先生领导革命极其艰难的阶段时，他从精神上、物质上支持了革命，特别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举家追随孙中山先生亡命东瀛。在中华革命的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一页。

就是这样一位有着非凡经历近乎传奇式的人物，一百多年前，曾在我昆山这块土地上也留下过他的足迹，这是沉重的、艰难的，但也是奋斗的足迹。

宋耀如本不姓“宋”，而是姓“韩”，1863年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一个普通的小商人家里，乳名叫韩阿虎。

1875年，韩阿虎才十二岁，被在美国波士顿开丝茶行的